

# 13—14 世纪丝路拓通背景中的日常生活书写<sup>\*1</sup>

## ——以杭州为探讨中心

唐云芝 吴志刚

(作者唐云芝,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吴志刚,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杭州 310028)

**【摘要】**:藉由蒙元王朝所力拓之东西丝路的畅通,13—14 世纪由东西作家共同参与的、以杭州为典型场域的中国日常生活书写,呈现出异质于传统形态的新变:基于国家疆域的大开与出行范围的广拓,视域开阔的空间体认与轻松愉悦的出行体验成为时人日常书写中的新风尚;建立于深切融合与互动基础上的多族化与国际化社交场域的形成,带来跨族属、国别交游书写的繁兴;多种世界性交流质素向中下层民众生活渗透,由此一改此前中土文人对丝路风物书写的整体虚拟形态与笔法。这些新变昭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文学发展观的内在机制与世界性书写这一文学形态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13—14 世纪丝路日常生活书写杭州

13—14 世纪的蒙元王朝通过空前的疆域扩张与发达的交通建设实现了海、陆丝路的全面拓通,中国历史呈现出开放与畅达程度前所未有的中西联结、南北一统的地理与政治格局。在此背景中,人们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较之前代发生着显著变化,而以此为对象的文学书写亦因应于这一时代新变。且于此期,先后沿着通达的丝路来到中国,以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伊本·白图泰等为代表的一批中世纪西方旅行家,更以其游历之作,使中国之民情日常,如大都、上都、杭州、泉州等一批丝路要道上的交流都会,第一次浓墨重彩地进入世界性书写。这些由东西作家共同参与的 13—14 世纪丝路拓通背景中的日常生活书写,构建出一幅极具世界性体验与交流的历史画面,尤其值得文学研究者关注。而较之政治加持的北方两都与纯海港城市泉州,依托于陆、河、海运交通的三线贯通,由南方偏安政权首都变为大一统帝国南方统治中心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枢纽,乃至成为 13—14 世纪以丝路为纽带的世界经贸体系中心之一的杭州,无疑是更具丰富典型意义的所在。因而本文拟以杭州为探讨中心,深入抉发丝路拓通背景中的日常生活书写之新变及其具体形态模式,进而揭显其文学史意义。

### 一、丝路拓通背景中的杭州空间及其日常出行书写之变

自“吴越开镇,南宋启都”,<sup>①</sup>杭州确立起“东南第一州”的地位,但却长期处于一个因南北对峙与割裂而相对闭锁的地理空间里。至元十三年(1276),蒙元军队攻入南宋都城临安,将偏安一隅近两个世纪的江南地区纳入一个“舆图之广,历古所无”<sup>②</sup>的南北大一统格局之中。后几经迁革,杭州被确立为蒙元王朝最富庶之江浙行省省治。并且,藉由南北大运河的直线贯通,加之元王朝海漕的开凿,及远通欧、非,近贯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国家的海上航线的开拓,作为运河南端的杭州,不仅成为蒙元初期所设七大市舶港口之一,亦成为泉州、庆元、澈浦、温州等其他海港通向帝都与腹地,以及帝都、腹地资源由各港口运往世界的重要接入与接出点。陆上丝路由大都南下,伸延至杭州;海上丝路由杭州进入运河,接续北进。在海、陆丝路的全面贯通中,杭州虽然在入元之

<sup>\*</sup>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14 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56)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明]刘伯缙等修,陈善撰:《万历杭州府志·序》,万历七年刻本。

后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成为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枢纽,也成为以丝路为纽带的东西经贸体系,尤其是世界海洋经贸体系的中心之一。

从“宋国旧宫墙”到“元朝新省府”,<sup>②</sup>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杭州及其外在关系空间成为与时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背景,也由此,观瞻与感慨杭州及其所处疆域空间的变化成为时人日常生活书写中的一种新风尚。

这可从13—14世纪时人登吟具有杭州地标性质的拱北楼诗窥见一二。拱北楼为大德年间蒙元政府改旧宋朝天门遗址所建,“阑槛北向,实拱皇都”,“示尊君亲上之诚也”。<sup>③</sup>可见,拱北楼实际可视为官方特设的一个代表着附归于蒙元大一统政权之后杭州政治与地理空间的象征实体。这座位于交衢中心的楼宇成为当时五方之人往来杭州的日常经行之处,也吸引着一批名贤俊彦登临吟咏。这些诗篇大多借楼咏城,体现出对杭州及其所处空间变化的自觉审视。如翰林馆臣赵孟頫与江浙行省色目官员庆童同上拱北楼,赋诗曰:“提封内向三千里,比屋同封百万家。”<sup>④</sup>喜登元朝廷祐首科进士的杭州士子杨载在金榜题名后登临拱北楼,目极南北:“北瞻帝阙三千里,南控臣藩二百州。”<sup>⑤</sup>沉于下僚的浙籍诗人朱晞颜亦感兴于拱北楼“雄吞二景开黄道”之地理位置,并勾连起杭州“远接三辰入紫薇”<sup>⑥</sup>的空间局势。可见,在蒙元南北一统格局中,杭州获得了向北向南极大延伸的外在关系空间,而活动于其中的诗人,不论身份、阶层,莫不对此有着自觉且自豪的体认与书写,并体现出逐渐向外投射的地理视域与更为开阔包容的地理眼光。14世纪中叶文人贡师泰言“杭之为郡,内接京畿,外控诸国”,<sup>⑦</sup>正是元人从国内与国际两个视角对杭州地缘与政治空间意义的敏锐把握。

国家疆域的扩张极大拓开了杭州的外在关系空间,自然也大幅拓展了杭州的日常出行范围,而于丝路拓通背景中全面打通的杭州陆、河、海运交通,更使得蒙元时期从杭州出行四方尤为通畅。其中主要由大运河带来的南北往还之便捷更使得时人以杭州为集散中心的南北流动之势在蒙元时期达到一个历史高峰,而以京杭运河贯通并由两京驿道延伸至草原上都的南北交通干线成为其时最为繁忙的一条出行路线。南方人士“至京师,北极和宁之地,以观乎兴王之胜地,以交于国人大族之豪杰”<sup>⑧</sup>为一时潮流。大拓的出行范围和疆域空间让时人尤其热衷于日常纪行书写,其中如钱塘道士马臻、遂昌诗人尹廷高、杭州径山寺僧楚石、金华道士王炼师等,皆为彼时由杭州出行两都并以诗记录往返全程的典型。从这些书写可以发现,蒙元时期的日常出行情境已深受丝路拓通背景影响而呈现出大异于前的时代面貌。

以14世纪初马臻出行两都之程为例。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马臻嗣天师张与材赴上都,经历了宋时南北两隔的马臻,于北上途中“一路吟诗写驿亭”。<sup>⑨</sup>据其诗,可知其先以水路,由钱塘江进入运河,渡长江,过维扬、瓜洲,再以驿路经行邳州、徐州、新州、东平等州县,又渡汶水、御河,水陆并进,于本年五月抵上都。“离家时节正条桑,船到瓜洲麦已黄”,<sup>⑩</sup>用时近四个月。次年春,经两都驿路,渡滦河南归,停大都下。又从大都直接以运河南下,暮春时节即归西湖滨上,用时仅两月左右。由于选择的交通方式与个人阅历的前后差异,诗人北上与南归呈现的出行体验有着明显差异。北上时“平野莽无人,飞沙垢颜脸”,<sup>⑪</sup>“上阙何时到,乡心日夜悬”<sup>⑫</sup>等,反复传达着的是羁旅行役之苦。南下则完全另一般光景。其《渡御河》有云:

御河出天津,浩浩流水急。质哉鼓儿船,一站过三日。

归心空如驰,布帆风力软。曲肢倚篷窗,草岸绕船转。

<sup>①</sup>[明]宋濂:《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1册,第138页。

<sup>②</sup>[元]释道惠:《送杨秀才游杭州》,杨镰主编《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年,第20册,第402页。

<sup>③</sup>[元]柳贯:《拱北楼铭》,魏崇武、钟彦飞点校《柳贯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45页。

<sup>④</sup>[元]赵孟頫:《杭州拱北楼》,任道斌编校《赵孟頫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

<sup>⑤</sup>[元]杨载:《题拱北楼》,《全元诗》,第25册,第268页。

<sup>⑥</sup>[元]朱晞颜:《拱北楼》,《全元诗》,第18册,第339页。

<sup>⑦</sup>[元]贡师泰:《杭州新城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5册,第304页。

<sup>⑧</sup>[元]虞集:《可庭记》,王颀校点:《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50页。

<sup>⑨</sup>[元]马臻:《回南》,《全元诗》,第17册,第53页。

<sup>⑩</sup>[元]马臻:《瓜洲渡书怀二首》,《全元诗》,第17册,第43页。

维舟纵晚眺,草色浮春空。广野无阡陌,欲往忘西东。

行行计故里,未觉道路长。缅怀燕耆旧,却在天一方。

舟车载名利,动越万里隔。诂识玄中言,若辱乃大白。

圣君执大象,万方文轨同。请看金台高,英贤尽趋风。<sup>③</sup>

鼓儿船是元初为调运粮食北上特地制造的一种轻捷之船。诗人乘着鼓儿船,北上时不知“上阙何时到”的焦躁疲倦,已变为“未觉道路长”的怡然自适,看似诉说着归心似箭,实际却似乎更不舍随着“浩浩流水”快速远去的京城与旧友,这从其由此前于风尘仆仆中哀叹“富贵非所愿”<sup>④</sup>的踌躇之状一改为高唱圣君募贤的积极之态亦可窥知。所以此诗虽为用杜甫纪行名作《东屯月夜》中之一联为韵而作,但显然与杜甫诗中呈现的浓郁“客愁”有着完全不同的诗境。这种诗境的差别,正是个体出行观念与交通体验的不同所致。所以,皆以运河往返京杭的尹廷高、释楚石、王炼师等人,北上与南归皆少有书写羁旅行役之苦,且随着视野的开阔,被反复载咏于诗的是于便捷的出行中所获得的疆域体认之喜。如“平生舆图见纸上,万里乾坤今眼观”<sup>⑤</sup>是初渡长江经行金陵的乍见之喜,“太平有象如何画,人在乾坤混一图”<sup>⑥</sup>是终抵大都的欢呼雀跃,“丈夫四方志,未用赋归田”,<sup>⑦</sup>“一览山河开耳目,何当弹铗赋归欤”<sup>⑧</sup>等,则莫不抒发着一种国家疆域大开中出行四方的壮怀激烈。

以此出行体验再来视此前提及的题咏拱北楼之诗,又可发现,除却杭州的南北空间局势之变,诗中展现的时人审视京杭空间距离的情境变化亦值得深味。代表如赵孟頫“举头便觉长安近,时倚阑杆望日华”,<sup>⑨</sup>朱晞颜“长安只在蝉蜒处,莫向西风赋落晖”。<sup>⑩</sup>综合二者诗境:伫立于南北坦途大开中的拱北楼之上,曾经不能企及的千里之外的京城,己如在咫尺,所以当送别时连离情别绪也毋庸有。在这里,“日近长安远”的经典情境被颠覆,援引西风与落晖赋颂离情的传统诗情亦被打破。虽为夸张化诗语,但确实切合了南北大运河的直线贯通使得京杭空间距离大大缩短的历史实情。由京城看杭州亦如是。诗人张之翰在大都送别友人赴杭任官,有诗曰:“莫惜辞燕远入吴,圣朝南北混车书。四千里是两都会,三百年开一坦途。簿领定应谈笑了,宴游多在治安余。西湖烟景钱塘月,尽作归舟卧看图。”<sup>⑪</sup>诗亦无半点离情之诉,倒是四千里如归的情境让人清新于目。

值得补充的是,14世纪中叶,蒙元后期的江南战火使得运河向北途梗,近海漕运航线成为南北交通要道,不仅京师“远使频从海上来”,<sup>⑫</sup>“乘桴浮海”也成为此时江南民众日常出行书写中一种频见的南北交通选择。这些航海出行书写,诸如“乘兴风波万里游,清如王子泛扁舟”,<sup>⑬</sup>“北斗天中银阙时,南薰海上金帆开”,<sup>⑭</sup>“挂帆遥发海东城,十日南风万里程”,<sup>⑮</sup>“月出蛟门生海潮,长风万里送轻舸”<sup>⑯</sup>等语所营构的稀松寻常、迅捷自如的航海情境,让人不得不意识到当时发达的海上交通已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联系。

<sup>③</sup>[元]马臻:《鲁中》,《全元诗》,第17册,第44页。

<sup>④④</sup>[元]马臻:《过沙河》,《全元诗》,第17册,第44、44页。

<sup>⑤</sup>[元]马臻:《渡御河用少陵日转东方白风来北斗昏为韵》,《全元诗》,第17册,第53—54页。

<sup>⑥</sup>[元]尹廷高:《丙午端阳抵郡》,《全元诗》,第14册,第49页。

<sup>⑦</sup>[元]王炼师:《大都》,《全元诗》,第24册,第84页。

<sup>⑧</sup>[元]尹廷高:《约正卿北行》,《全元诗》,第14册,第22页。

<sup>⑨</sup>[元]王炼师:《白沟河》,《全元诗》,第24册,第87页。

<sup>⑩</sup>[元]赵孟頫:《杭州拱北楼》,《赵孟頫文集》,第216页。

<sup>⑪</sup>[元]朱晞颜:《拱北楼》,《全元诗》,第18册,第339页。

<sup>⑫</sup>[元]张之翰:《送李仲芳赴临安行省掾》,《全元诗》,第11册,第125页。

<sup>⑬</sup>[元]成廷珪:《寄湖州兀颜太守时有福建参政之除》,《全元诗》,第35册,第424页。

<sup>⑭</sup>[元]朱希颜:《自题》,《全元诗》,第21册,第405页。

<sup>⑮</sup>[元]刘仁本:《送进士王好问浮海会试》,《全元诗》,第49册,第243页。

<sup>⑯</sup>[元]释来复:《送马易之编修泛海北还》,《全元诗》,第60册,第136页。

<sup>⑰</sup>[元]张庸:《送龙子高都事航海之山东》,《全元诗》,第54册,第120页。

可以说,蒙元时期的辽阔疆域与畅达交通完全改变了南宋以来吴越之士“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及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的出行情境,时人乐享于千里乃至万里之行,且“殊无依依离别之情”。<sup>①</sup>以故,文人纪行四方的主题突破传统之疲途、乡愁与离情,而更多着意于传达对其所处广袤疆域空间的自豪体认以及轻松愉悦的出行体验。正是“天朝一四海,荒徼犹近邻”,<sup>②</sup>“古云行路难,今作等闲看”,<sup>③</sup>蒙元时期的日常出行呈现出与13—14世纪丝路拓通背景中“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适万里者如出邻家”<sup>④</sup>这一时代性体验相呼应的面貌。

## 二、多族化、国际化社交场域的形成与跨族属、国别交游书写之兴

如果说13世纪的蒙古通过东西征略“将昔日阻塞未通之道途,尽开辟之,而使一切民族种姓,聚首相见”,<sup>⑤</sup>并在包容的民族与文化政策中建立起“一视同仁,无间中外”<sup>⑥</sup>的多族化与国际化融居与社交场域,那么“五方之人,咸集于此”<sup>⑦</sup>的杭州正是其时规模最大的典型子场域之一。不仅因戍军、仕宦与观览北下杭州的蒙古族人数量庞大,内迁之西域色目民族“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杭州尤多”,<sup>⑧</sup>东西丝路开放中,旅居来杭的异国人士亦是不绝如缕。异族异国人士的大量迁入与过往,必然极大丰富杭州的日常社交空间,其中之文化精英更是与杭州本土文化圈建立起辐射广泛的日常交际网络,建立于多族士人频繁且深切互动基础上的跨族属、国别交游书写也由此空前兴盛。

综观蒙元时期通过丝路内迁中土之蒙古色目后代文化精英,若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刺、高克恭、康里巉巉、丁鹤年、余阙、聂古柏、泰不华、三宝柱、斡玉伦徒、伯笃鲁丁、薛昂夫、迺贤、沙班、月鲁不花、吉雅谟丁、金哈刺等近二十位“舍弓马而事诗书”<sup>⑨</sup>者,因寓居、仕宦或游观,无一不与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圈建立着亲密联系。翻阅诸人之诗文,及较长时间活跃于杭州的文人文集,无论是仕宦显达的邓文原、袁桷、赵孟頫、黄潜、柯九思、高克恭、刘仁本,还是地方俊彦,如仇远、张雨、鲜于枢、杨载、杨维桢、胡助、吴莱、张可久、戴良等,甚至是以王冕、释惟则、马臻等为代表的隐于山林、禅室、道院之草根民众,皆可见大量日常交游往来书写作。

作为蒙元臣服国,朝鲜半岛上主要由元丽陆上丝路来华的高丽人士,也在蒙元时期大量深入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化交际圈。14世纪30年代初,高丽诗僧式无外由王京渡过鸭绿江来到大都,数年后北下江南游两浙,与道士张雨相会于杭州开元宫,时任江浙儒学提举的黄潜适逢其会,由是赓酬唱和,“不期而集”,成为“一时之高会”,甚至有好事者绘《文会图》记之。<sup>⑩</sup>由此次集会产生的诗与图很快流传于江南乃至京师士人间,金华吴师道、莆田陈旅、大都宋褰皆有诗次韵以赋其事。游观江南后,式无外复从江南返大都以归高丽,时已转职京城的黄潜,及一批京师文人又皆作诗送之。

13—14世纪以日僧为主要对象的中日交游书写的兴盛更是见证了蒙元丝路拓通对时人日常社交拓展的力量。日本是蒙元发动两次战争皆未征服的国家,终元之世蒙日政治上并无建交,但东海航线上的日本商船往来却意外频繁,而搭乘商船频登东南港口的日僧也成为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方文人圈中的异国风采,<sup>⑪</sup>并普遍与中土文人建立起深厚私交。若“慕法五天竺,十七来钱塘”<sup>⑫</sup>的钵仲刚,“丹丘博士(柯九思)与饮酒,青城先生(虞集)邀赋诗”,<sup>⑬</sup>现存元人与其交游诗作近二十首,涉及作者有释僧妙

<sup>①</sup>[元]苏天爵:《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全元文》,第40册,第84页。

<sup>②</sup>[元]释大圭:《送同邑长高昌公北上》,《全元诗》,第41册,第347页。

<sup>③</sup>[元]袁桷:《行路难五首(其三)》,《全元诗》,第21册,第336页。

<sup>④</sup>[元]王礼:《义冢记》,《全元文》,第60册,第655页。

<sup>⑤</sup>[民]李思纯:《元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74年,第8页。

<sup>⑥</sup>[越]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二《大元诏制·元统三年诏》,中华书局,1995年,第58页。

<sup>⑦</sup>[元]贡师泰:《杭州新城碑》,《全元文》,第45册,第304页。

<sup>⑧</sup>[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真教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9页。

<sup>⑨</sup>[元]戴良:《丁鹤年诗集序》,《全元文》,第53册,第276页。

<sup>⑩</sup>[元]黄潜:《庚戌正月二十一日予与儒公禅师谒松瀑真人于龙翔上方翰林邓先生适至予为赋诗四韵诸老皆属和焉后三十一年岁辛巳正月二十三日过伯雨尊师之贞居无外式公刘君衍卿不期而集辄追用前韵以纪一时之高会云》,《全元诗》,第28册,第292页。

<sup>⑪</sup>[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94-395、465页。

<sup>⑫</sup>[元]丁复:《扶桑行送钵仲刚东归》,《全元诗》第27册,第435页。

声、宗泐、良琦，文人郑元祐、丁复、柯九思、虞集等。

这类交游书写之兴，数量的丰富、参与者的广泛皆只能说是其表象，映射于其中的多族士人相知相契的深情厚谊与和谐相融的文化互动情境，及这一情境背后潜藏的由 13—14 世纪蒙元丝路拓通背景带来的“四海一家”“无间中外”这一富涵地域开放性与文化包容性的时代精神，应是更值得深究的内在动源。

释惟则《箏篥引》中追忆其听贯云石以汉家铁笛吹奏北庭曲乐之情景，诚可为 13—14 世纪丝路拓通背景中杭州多族文人交谊深厚、情感相契的一个典型场景：

西瑛为我吹箏篥，发我十年梦相忆。钱塘月夜凤凰山，曾听酸斋吹铁笛。初吹一曲江风生，余响人树秋呜咽。再吹一曲江潮惊，愁云忽低霜月黑。坐中听者六七人，半是江湖未归客。欢者狂歌绕树行，悲者垂头泪沾膝。我时夺却酸斋笛，敛襟共坐松灵石。……<sup>①</sup>

此诗作于贯云石谢世十年后。箏篥是较早传入中原的一种西域乐器，铁笛则是汉族民间自制的一种乐器。于诗中可见，铁笛已被贯云石熟练地用来发其“身在东南忆西北”<sup>②</sup>的思乡之情，并由此引发一众听者的桑梓之思。以往刻绘胡乐之诗词往往着眼于表演者的高超技艺或曲乐的变幻莫测，但释惟则《箏篥引》着重呈现的却是诗人与现实和追忆两重情境中吹曲之人深厚的情感联系。现实情境中按奏西域箏篥的阿里西瑛与释惟则共緬亡友，追忆画面中横吹汉家铁笛的贯云石与六七“未归客”同叙客愁。不得不谓多族士人情感的相契不仅无丝毫文化隔膜之痕，反有着扣拨人心的惺惺相惜与高山流水之谊。这种真挚情谊在欧阳玄于《贯云石神道碑》中追忆二人相游西湖、缱绻难舍之情节亦能读取，<sup>③</sup>在杨维桢于贯云石逝世二十年后仍于梦中与贯云石畅游赋诗的情景也可感知。<sup>④</sup>以此来看，同为时局危亡之际为蒙元政权保有东南势力的臣子，金哈刺与刘仁本“往来防御事，一一赖斯文”<sup>⑤</sup>的“知己”之谊，亦莫不为金、刘苦中作乐与互勉共娱的情谊所驱。<sup>⑥</sup>

以布衣文人王逢赠与日僧进得中为代表的交游诗作则为 13—14 世纪中外文人于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和谐相融的文化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细节。进得中是一位汉文化修养非常高的日僧，因要抄录王逢所注《杜诗本义》，遂留居王逢家中旬日，二人因此交流甚切。进得中也对王逢讲述了很多关于日本故实民情，这在王逢诗作中颇有反映。如《寄题日本国飞梅并序》：

国相管北野者，刚正有为，庭有红梅，雅好之。一日，被诬，谪宰府。未几，梅夜飞至。北野卒死谪所，国人立祠梅侧。僧进得中云。

瘴日云霾不放归，精神解惑禹梁飞。水香霞艳浑无恙，瘦比累成带减围。<sup>⑦</sup>

序中所言管北野，即日本平安时代著名政治家与文学家管原道真。管原道真辅佐天皇致力改革时弊，颇有卓绩，受到国人爱戴，但却因触犯到外戚藤原氏的利益而被诬陷谋逆，遂被流放太宰府，不久即染病而逝。“飞梅”是日本民间人人皆知的一个关于管原道真的传说。据说管原道真平素十分爱惜家中庭院之红梅，及被贬临发时，不舍而赋诗与之别：“东风吹兮梅花香，虽与主兮毋忘春日之洋洋。”<sup>⑧</sup>闻者甚悯，红梅亦为之动容。在管原道真被贬不久之后，红梅夜飞至其贬所，以慰主人之愿。进得中将这个日本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说讲与中国诗人王逢，王逢感其事而发于诗，可以说是在深切的文化互动中，与进得中达成了一种跨越了山海与国度的历史与情感共鸣。虽然序中所叙“飞梅”传说与原传说有所偏差，但诗中以病容憔悴的管原道真与开得正鲜的红梅所传达出的哀婉情致却甚是符合日本“飞梅”传说的动人情韵。

值得注意的是，往往认为如贯云石、金哈刺等融入中土文化圈的蒙古色目文士是以其汉化为基础，但不可否认他们依然携带着鲜明的异族背景，异国旅居之客则更是如此。但贯云石能尽情向中土友人抒发其“身在东南忆西北”的客愁之思，金哈刺游离江南时也能以诗明其基督信仰，<sup>⑨</sup>梯山航海而来的进得中亦能侃侃介绍其国之历史故实，而这一切又被蒙元时期的中土文人予以

<sup>①</sup>[元]郑东：《送日本僧之京》，《全元诗》，第 46 册，第 204 页。

<sup>②</sup>[元]释惟则：《箏篥引》，《全元诗》，第 33 册，第 160 页。

<sup>③</sup>[元]贯云石：《观日行》，胥惠民等辑注：《贯云石作品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12 页。

<sup>④</sup>[元]欧阳玄著，汤锐校点：《欧阳玄全集》卷之九《元故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四川大学出版

诚挚的接受、认可，甚至共情。可见，作为少数民族掌握绝对政治权力，及外来文明强势冲击下的汉族传统文化的弱势守护者，处于蒙元丝路拓通背景中的中土文人不仅未自封于种族之限，而是深受“四海一家”“无间中外”这一时代精神的沾溉，同样有着“包举海宇”“一视同仁”的气度与胸怀。所以在日常交游书写中，他们明晰着他族友人的族属或国别，也并不吝其赞美与肯定：杭僧释德净送北庭人蒙古赴任海康赞“北庭北多俊杰，今古世皆知”，<sup>①</sup>杨维桢送别唐兀氏昂吉亦指出其“西凉家世东瓠学”<sup>②</sup>的背景，丁复“一一作歌”送别铎仲刚，“仿佛扶桑之故乡”。<sup>③</sup>明晰的族属、国别认知与真挚和谐的交谊并存，这也正是跨族属、国别交游所以成立的内核所在。

14 世纪初叶，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从家乡威尼斯来到杭州，为这里多族人民的和谐相融所惊叹：“那样不同的种族能够和平地居住在一起，受统一政权的管理，我感到这种事实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之一。”<sup>④</sup>诚是对蒙元丝路拓通背景中杭州多族化与国际化融居与社交场域的有力注解。

### 三、商贸扩大与杭州日常生活书写中的丝路风物纪实

开展商贸是丝路拓通的要义之一，于重利的蒙元政权尤为如此。所以当蒙古通过征并西域、夏、金，全面打通亚欧陆上交通，陆上丝路商贸往来即随之而盛；待统一南宋后又锐意扩张海权，发展舶商，则创造了“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sup>⑤</sup>的海舶盛况。丝路商贸的扩大使得此前主要由皇家、贵族把控的丝路资源，由以宫廷为典型的中央特权场域，向外延伸至地方士人乃至平民场域，而“岛屿外国珍奇诡异之物，莫不于是焉集”<sup>⑥</sup>的杭州，又是其中之典型场域。这些丝路质素的频繁流动与大幅普及，极大拓展着时人的知识与见闻，也因此，处于蒙元时期的人们，对于域外世界信息与资源的书写，不再局囿于此前有限的官方史书及常流于虚夸的笔记传奇形态，而往往能够藉由个人之亲历亲闻自觉输出于日常生活纪实之笔触。

其一即此前少见的、或被视作“珍奇”的，且多以虚写意象进入文学书写的丝路风物，在 13—14 世纪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进入平民生活，并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书写中的纪实性题材。

如在唐宋时期仍属贵族水果的初代丝路风物葡萄，及仅见于边塞地带、宫廷富室及胡人酒肆中葡萄酒，在蒙元时期已成为江南本土能进行规模化生产的日常商品。<sup>⑦</sup>而在“行尽葡萄三十里”<sup>⑧</sup>与“万株联络水晶棚”<sup>⑨</sup>的现实体验中，元诗中的葡萄与葡萄酒，不再如唐宋诗词中最常用来作为代指西域或丝路珍品的泛拟意象，而往往于人情往来的日常背景中有着更为鲜活生动的具体面貌。诸如“山僧惠我紫葡萄，个个匀圆带粉膏”，<sup>⑩</sup>“葡萄美酒斗十千，杨柳小蛮腰一束”，<sup>⑪</sup>“芙蓉春帐，葡萄新酿，一声《金缕》尊前唱”<sup>⑫</sup>等，皆是江南士子于日常活动中对葡萄或葡萄酒的热情书写。令人注意的是，题画葡萄也在元代流行起来。13、14 世纪之交居杭州西湖玛瑙寺的释子温即是其中一位以醉画葡萄知名的画僧，人称“翁葡萄”。其画深受时人推崇，往来西湖之名士布衣，如邓文原、柯九思、鲜于枢、杨载、虞集、揭傒斯、吴莱、郑元祐、胡翰、刘仁本、张宪等皆有诗题之。而由“满框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sup>⑬</sup>等句，实又可见画上葡萄满溢的生活气息。

社，2010 年，第 210—211 页。

④[元]杨维桢：《庐山瀑布谣》，《全元诗》，第 39 册，第 29 页。

⑤[元]刘仁本：《寄刘德玄知己》，《全元诗》，第 42 册，第 342 页。

⑥按：金哈刺《南游寓兴集》交游诗作近 200 首，占诗集总篇数之半，尤与元末掌领东南海运事的刘仁本酬唱频繁。参见段海蓉《从交友诗看金哈刺的思想》（《民族文学研究》2009 年第 1 期），刘嘉伟《元代弗林诗人金哈刺刍议》（《文学遗产》2016 年第 3 期）。

⑦[元]王逢：《寄题日本国飞梅有序》，《全元诗》，第 59 册，第 271 页。

⑧[日]菊池宽著，陈致平译：《新日本外史》，中日文化协会广东省分会，1943 年，第 65—66 页。

⑨[元]金元素：《寄大兴明寺元明列班》，《全元诗》，第 42 册，第 381 页。

⑩⑪[元]释德净：《次韵钱蒙古松壑金事之海康任》，《全元诗》，第 20 册，第 50 页。

⑫[元]杨维桢：《送昂吉会试京师》，《全元诗》，第 39 册，第 294 页。

⑬[元]丁复：《扶桑行送铎仲刚东归》，《全元诗》，第 27 册，第 435—436 页。

⑭[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转引自[法]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23 页。

⑮[元]汪大渊原著，苏继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岛夷志后序》，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85 页。

⑯[元]舒頔：《送杨子成归钱塘序》，《全元文》，第 52 册，第 204 页。

甚至以乳香与胡椒为代表的进口香料在蒙元时期也成为地方士绅日常书写中习见的馈赠之物。杭州布衣诗人侯克中《杨招讨送乳香胡椒答以木瓜煎戏赠》诗曰：

熏陆番椒各有差，海南方物到贫家。自惭不及前人德，投我琼琚报木瓜。<sup>⑭</sup>

乳香自汉唐以来流行于上流社会，又名熏陆，其上品称“滴乳”。金华山林诗人叶颙曾获好友赠送滴乳香，有诗详陈其形、臭<sup>⑮</sup>胡椒在元前则主要被用作药物，亦为时之珍品。唐代即有宰相元载贪渎胡椒八百石之事，<sup>⑯</sup>胡椒在唐宋时期进入诗歌书写则基本为用此典故。入元后，胡椒却成为东南地区民众日常消费量极大的一种饮食佐料。<sup>⑰</sup>元初来到杭州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为这里的胡椒消费量感到震惊。<sup>⑱</sup>乳香与胡椒之所以能在蒙元时期从上流阶层流入“贫家”，并被时人作为纪实性题材书写，畅达的丝路交通带来的大宗进口起着关键作用。时人宋本面对泉州海舶盛况，作有诗曰“熏陆胡椒媪腊齐，明珠象齿骇鸡犀。世间莫作珍奇看，斛使英雄价尽低”，<sup>⑲</sup>正是对蒙元发达的海外贸易使得多种珍奇蕃货不再珍奇现象的惊叹。

元代诗中切实可亲的胡贾形象亦让人印象深刻。王沂《老胡卖药歌》以生动传神的笔触刻画了一位久居江南的阿拉伯卖药回回：“西城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全家妻子得安居，篋里青蚨夜还数。灯前酌酒醉婆娑，痼疾痲癩易得瘥”。<sup>⑳</sup>较之唐宋笔记小说中以“识宝回回”为代表的，以中土观念想象与虚构的传奇性与夸张性形象，王沂笔下的贾胡则完全是于日常生活中近距离、长时间观察与接触中的纪实形象，亲切、自然而又可敬。同理如吴元德《观贾胡停车》中在大都街市驾着马车的贾胡妇，<sup>㉑</sup>马祖常于吴地亲见的“黄金腰带耳环穿”<sup>㉒</sup>的波斯海贾，皆是对一度游离于中原本土生活外围的丝路胡商，于蒙元时期“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洲焉”的背景下深入普通民众日常的典型化纪实书写。

藉由丝路的畅通与商贸的扩大，13—14世纪的杭州日常生活书写中还出现了一些全新的丝路风物纪实形象。

如被视为“海夷奇兽”的斑马便是在朝贡商贸的驿路传递中于13世纪末进入了江南民众的视域，并成为文人日常书写中的“眼前珍奇”。蒙元规定“远方以奇兽异宝来献者，依驿递”，<sup>㉓</sup>曹伯启有诗曰《海夷贡花驴过兰溪书所见》，即记叙了其任兰溪主簿时，南亚马八儿国来入贡花驴，在转入杭州驿前经过兰溪驿的情景。所言“昨夜灯前成独笑，痴儿方诵旅葵篇”“航海梯山事可疑，眼前今日看珍奇”，<sup>㉔</sup>完整呈现了诗人对“梯山航海”之事从质疑到眼见为实的一段心路历程。“花驴儿”即斑马，为非洲特产。可见，马八儿国是先从非洲买入斑马再赴华进献，路线一般是航行西洋约十万里至泉州港登岸，<sup>㉕</sup>再转从杭州由运河北上大都。而杭州驿作为东南诸藩入贡北上大都的中转枢纽，《元史》载：“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鹞，留下二十有七日”，<sup>㉖</sup>则不知有多少“梯山航海”而来的珍禽异兽成为时人之“眼前珍奇”了。曾任官于浙东的安徽诗

<sup>7</sup> ⑦参见尚衍斌、桂栖鹏《元代西域葡萄和葡萄酒的生产及其输入内地论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3期。

⑧[元]艾性夫：《富阳出陆》，《全元诗》，第19册，第166页。

⑨[元]成廷珪：《高昌王所书画葡萄熊九皋藏》，《全元诗》，第35册，第463页。

⑩[元]华幼武：《楷上人送葡萄二首》，《全元诗》，第46册，第80页。

⑪[元]吴毅：《联句毕诗兴未已复以毅句霜脍新供缩项鳊分韵得缩字》，《全元诗》，第50册，第213页。

⑫[元]张可久著，吕薇芬、杨镰校注：《张可久集校注·中吕·山坡羊·春日二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⑬[元]邓文原：《温日观葡萄》，《全元诗》，第19册，第12页。

⑭[元]侯克中：《杨招讨送乳香胡椒答以木瓜煎戏赠》，《全元诗》，第9册，第72页。

⑮[元]叶颙：《谢邵仲才惠滴乳香》，《全元诗》，第42册，第154页。

⑯⑰[唐]欧阳修：《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714页。

⑱按：元代饮食典籍无论是宫廷膳师所编《饮膳正要》，还是民间文人所撰《饮食须知》《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居家事类必用全集·饮食类》等，皆已屡见胡椒的使用。

⑲[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五一重章《补述行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60页。

⑳[元]马祖常：《舶上谣送伯庸以蕃货事奉使闽浙》，《全元诗》，第31册，第90页。

㉑[元]王沂：《老胡卖药歌》，《全元诗》，第33册，第42页。

㉒[元]吴元德：《观贾胡停车》，《全元诗》，第30册，第371页。

㉓[元]马祖常：《绝句十七》，《全元诗》，第29册，第382页。

㉔[明]宋濂：《元史》卷二十三《本纪二三·武宗二》，第2册，第511页。

人舒頔有《骆驼鸡行》，所赋“铁冠鳧啄颈连翠，豕身鸡项足无距”的骆驼鸡，即是外夷“数千里外远来献”<sup>⑨</sup>的非洲鸵鸟。

值得注意的是，素来为皇室进贡珍品的斑马竟在 14 世纪进入了杭州市民消费领域。后至元四年(1338)，元末诗人王冕在杭州集市上见到回回人牵着一只“能解人意，且能省识回人语”的花驴儿进行表演，引得百姓皆来围观，回回人以此获利。王冕遂作《花驴儿》一诗讽喻现实。抛开江南水惠民饥的传统现实背景，王冕诗中“奇遇”的这只花驴儿如何“渡江踏动江南土”<sup>⑩</sup>走入市民视域的广阔丝路背景似乎更让人好奇。回回驯斑马获利于江南民间，显然这只斑马已非朝贡而来。那么这只斑马是如何从其家乡非洲草原踏入江南水乡呢？花驴主人回回的身份或许是个切入点。在元代，回回主要用以指称信奉伊斯兰教的西域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中亚的突厥各族。<sup>⑪</sup>王冕诗中牵着驴儿表演为生的回回，则很可能是来自波斯的嚙哩回回，亦即伊斯兰历史上牵着毛驴流浪为生的吉普赛人。吉普赛人最初来到中国是由蒙古西征从波斯带来，也有自动流浪到中国来的。<sup>⑫</sup>王冕诗中的吉普赛流浪者则应该是流浪到非洲的嚙哩回回在蒙元时期携着斑马，沿着海上丝路的商贸流动，一路漂泊航行而至中国的，毕竟以私人身份从非洲以外的地方获取斑马应该都是件非常不便宜的事情。

蒙元时期，非洲草原的斑马、鸵鸟能够渡海来杭，成为中土文人抨击现实的纪实性题材，并非偶然之特例，它们与时人日常生活书写中“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葡萄佳酿、南海风物，及融于中土生活的贾胡们，共同揭示出的，是一个 13—14 世纪由频繁且极速流动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支撑与刺激的，已然成熟存在的世界性丝路背景。所以观 13—14 世纪日常生活书写，无需讶异于让平民士子“三酌颠倒相扶将”<sup>⑬</sup>“烂醉西风也不妨”<sup>⑭</sup>的阿刺吉酒的出现，“殊方嘉寔未知名”的新鲜西域诸果现身于江南寺院，<sup>⑮</sup>“中土向来惟见画”的塞上骆驼，不仅于北方都城“动成群”，<sup>⑯</sup>南方杭城亦存其剪影；<sup>⑰</sup>亦不必感喟于早在 14 世纪初中叶于服饰鞋帽上已席卷中土四方的“韩流”，不仅都城女子“方领过腰半臂裁”，<sup>⑱</sup>江南儒士亦“紫藤帽子高丽靴”；<sup>⑲</sup>也似乎不必怀疑伊本·白图泰所记杭州城里活跃着一支可用汉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三种语言演唱的中西合璧乐队<sup>⑳</sup>是否真实，因为就连“巷南巷北痴儿女，把臂牵衣学番语”<sup>㉑</sup>的现象于时人而言亦不稀奇。

## 余论：时空体系的嬗变之于文学史的意义

归结上文的探讨，可以确然把摸到在 13—14 世纪蒙元王朝的丝路拓通背景中，由东西作家共同参与的、以杭州为典型场域的中国日常生活书写所彰显的具体形态模式。其一，13—14 世纪居于蒙元广阔的疆域空间与迅捷的交通网络中的人们，有着大幅外拓的日常空间与出行范围，所以一方面，蒙元时期的日常空间书写体现出更为开阔包容的地理视域，另一方面，在自觉“游观”四方的出行动机下，文人日常出行书写的重点往往不再是传统之疲途、乡愁与离情，更引人侧目的主题是自豪的疆域体认与愉悦的出行体验。其二，在“四海一家”“无间中外”的东西丝路开放中，异族异国人士以杭州为集散中心的大量迁入与过往，极大助推着以深切交流为基础的多民族性与国际性日常社交场域的形成，并由此带来蒙元时期跨族属、国别交游书写的繁兴。这些体现出多族文人真挚友谊与和谐互动的交游书写，也成为蒙元时期“多元一体”中华文学形成的重要见证。其三，依托丝路商贸往来的

<sup>⑨</sup>[元]曹伯启：《海夷贡花驴过兰溪书所见》，《全元诗》，第 17 册，第 380 页。

<sup>⑩</sup>[明]宋濂：《元史》卷二百一十《外夷传三·马八儿等国》，第 15 册，第 4669 页。

<sup>⑪</sup>[明]宋濂：《元史》卷二十三《本纪二三·武宗二》，第 2 册，第 511 页。

<sup>⑫</sup>[元]舒頔：《骆驼鸡行》，《全元诗》，第 43 册，第 362 页。

<sup>⑬</sup>[元]王冕：《花驴儿》，《全元诗》，第 49 册，第 334 页。

<sup>⑭</sup>杨志玖：《元代回族史稿·绪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 页。

<sup>⑮</sup><sup>①</sup>参见杨志玖《嚙哩回回——元代的吉普赛人》，《元代回族史稿》，第 42—52 页。

<sup>⑯</sup>[元]黄玠：《阿刺吉》，《全元诗》，第 35 册，第 205 页。

<sup>⑰</sup>[元]李晔：《谢王彦祥见惠阿刺吉酒》，《全元诗》，第 56 册，第 66 页。

<sup>⑱</sup>[元]释大新：《谢张雪峰司农惠西域诸果》，《全元诗》，第 32 册，第 177 页。

<sup>⑲</sup>[元]傅与砺著，杨匡和校注：《傅与砺诗集校注》卷八《骆驼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96 页。

<sup>⑳</sup>按：郑元祐《杭州即事》记元末兵乱中的杭州，其中有曰“祠宫地卧驼鸣圃，秘殿春扃马矢臊。”（见《全元诗》，第 36 册，第 337 页。）

<sup>㉑</sup>[元]张昱：《宫中词》，《全元诗》，第 44 册，第 56 页。

<sup>㉒</sup>[元]陶宗仪撰，李梦生校点：《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309 页。

<sup>㉓</sup>[摩洛哥]伊本·白图泰著，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553 页。

<sup>㉔</sup>[元]潘纯：《送杭州经历李全初代归》，《全元诗》，第 36 册，第 427 页。

频繁与极速流动,多种世界性交流之质素向中下层民众日常生活渗透,并由此输出于时人日常生活书写之纪实笔触,从而扭转此前中土文人对丝路风物书写的整体虚拟形态与笔法。

如若说文学是建基于时空体系的艺术,而上述日常书写的新变及其具体形态模式,实则凸显了前此文学史研究中尚未充分研究的重要一环,此即为时空体系中的空间维度。<sup>⑩</sup>13—14世纪日常生活书写在情感、主题、类别、笔法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异质于传统形态的崭新面貌,正是缘于蒙元政权力拓之广阔丝路背景所造就的全新时空格局。基于此,则可重新审视与把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文学发展观及其内在机制。作为学术史上的重要命题,清代焦循已有论及,<sup>⑪</sup>复经王国维阐发,<sup>⑫</sup>围绕着楚骚、汉赋、骈文、唐诗、宋词以及元曲所构建的谱系已成常识。这一范式聚焦于主导文体,并以时间维度为视角,固然易观文学流变之大体,但更多地是从文学内部来思考其发展演化的。而13—14世纪丝路拓通这一背景则将与时间维度相关联的空间维度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并将文学内外部之间的联动机制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来。简言之,伴随着空间布展的更新与扩大,不独地理疆域得以拓展,人的迁移流动亦得以实现,孕育文学的社会形态发生质性的变化。而文学内部的源流传统与文学外部的时代变化的交互,使得文学的新变不独作用于主导文体,兼且体现于各个层面。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上,从更为广阔的空间维度着眼,一个时代的文学实则在整体上展现着共振和鸣的历史形态。<sup>⑬</sup>因而时空体系及其演变,实则构成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文学发展观的内在机制。

不惟如此,时空体系复以其不同的组合形态造就了更具普遍性的文学形态,揭显了文学的发展趋向。时空体系在不同时期,或以时间维度为主导因素,或以空间因素为中心,仅就13—14世纪的蒙元时期而言,空间布展的空前扩大无疑是更迭荡时代人心的力量。此期的日常生活书写,则整体构建出一幅极具世界性意义的体验与交流画面,开启了中外文学之间具有世界意义的交流与沟通,这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文学形态。仅就本文而言,世界性文学书写作为一种文学形态,伴随着空间的拓宽,呈现出一种文学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迟滞或阻断了这一发展趋势,而当从时下全球化的时空格局回望这曾在13—14世纪发生的世界性文学书写,则依然不能不慨叹于其具有之文学史价值。因为世界性文学书写这一历史实践,不独与今日之情实相近,而且较之歌德(1749—1832)提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则整整早了数个世纪。

是故,若欲评介蒙元之历史与文学,乃至13—14世纪世界之历史与文学,这一奠定全新时空体系的丝路实是不可不措意之所在。

<sup>⑩</sup>按:近年来兴起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已然敏锐地把握到地理这一空间维度的重要因素之于文学的重要意义。而本文所指称的空间维度,不惟涵容相对静态的地理因素及其所属文化,兼且包蕴相对动态的人的流动及其文化交互。

<sup>⑪</sup>按:焦循在《易余籀录》卷一五中提出了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著名观念,于文学史编写与研究的影响甚巨。其详情与价值,可参见周勋初先生《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sup>⑫</sup>参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中华书局,2010年,第1页。

<sup>⑬</sup>按:也正基于空间维度所凸显的这一历史形态,较之于作为主流的元曲,包括诗文在内的其它文学作品的意义非但不会弱化,反而昭示了其在究明文学发展演进这一问题上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